采風 Feature 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查小欣

《爆足一周》反應參差

在TVB主持的《爆足一周》首播，外界反應參差，大概分成三派：渴料派，狠評節目無料爆；護偶派，指斥不應爆藝人私隱；收料派，認為一站式收風，夠方便。

內地及香港記者紛紛來電問回應，問我對十七點收視是否感到失望，我沒感失望，反而是預期之中，翻看過往紀錄，星期日晚十至十一點的收視都是徘徊在十七、十八點，《爆足一周》沒推高收視，幸也沒在該時段流失觀眾。

《爆足一周》的設計是把錄影廠變成編輯室，我作為總編輯跟一班編輯、記者、採主開會，帶出該個星期最爆的娛樂新聞，用行內人的語言講出背後的故事，批評事件的處理手法，在我和一班拍檔的說話當中，帶給觀眾娛樂，由於形式創新，錄影完第一集已知道觀眾需要時間適應。

果然有記者問：「你是否第一次做電視節目，所以不懂得看鏡頭和助導的計時手勢呢？因為你的拍檔說話很長，你也不叫停。」

事實是，這是節目設計的一部分，試問各記者向總編輯報料，力爭表現，又怎會盯緊鏡頭？有別於其他節目，是一小時的騷，只有流程，沒有台詞稿，全部靠各人自我發揮，是一種比較新的做法，助導亦不會報時做倒數，目的是要保持氣氛，用自然流暢的方法傾偈放料，台前幕後對於這種「自由式」的設計，需要時間適應。

有記者肉緊指出：「那豈不是要你做炮灰？」

我更正他：「不是炮灰，是實驗品，試做一個新品種的節目，很具挑戰性，我向來做開荒牛，知道過程不容易。」

由於後期製作需時，首兩集是提早兩天錄影，以至兩日後節目出街，新聞變舊聞，幸好第三集（十月廿一日播）已爭取到直播，獲觀眾一致好評。

天言知玄

楊天命

第一課的死別

助手突然請了一天事假，原來一位他非常尊敬的前輩離開了。

助手八字食傷星多，向來是位多愁善感的人。自這位前輩患上絕症後，連月來他總是不斷探望對方，也知道他早為此事而流過不少眼淚。雖然作為跟我共事多年的親信，但助手其實甚少向我提出算命及看風水等等的要求，直到這位前輩病重，他才問我能否替之算算八字，看看有甚麼補救及改命之法，可見這位朋友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舉足輕重。

其實這位朋友的八字滿盤「印星」及「比星」，明顯是個像一條充氣太足的車胎的命格，很容易因任何變化而爆破，是典型的「身旺無意依」之造。這兩年就因流年出現疊疊的刑沖、用神受傷及犯太歲的負面影響，自然難逃病危及劫難的威脅，所以他在秋天完結前撒手人寰，其實完全沒有逃出過八字算命術的預測。

助手曾經問我，他的這位長輩一生煙不離手，這次患上肺癌，到底是自己種下的惡因？還是先天所注定的命運？若單從八字而論，他就算終生不吸煙，這兩年肺部也定會出現問題，只能說病情可能會來得輕微一些。不過，為何他會如此熱愛吸煙？當中或多或少也有些命數使然的成分，所以到底是先天的因，還是後天的因，確實是一條像「有雞先，定有蛋先」的問題，最後誰也解答不了。

助手後來告訴我，這位前輩的離開雖然令他心裡如遭雷殛般一陣難過，但到頭來，他心底的另一邊確實感到一陣欣慰，皆因過去一月對方一直遭受到極大的身體痛苦，離開其實算得上是一種解脫。對助手而言，這段經歷也算得上是一種心靈的解放，因為此乃他成長後的第一課死別。

助手最後對我說：這位前輩過去所教他的知識和經驗，更將一世陪着他成長壯大，絕不會有任何的白費！

琴台客聚

彥火

給母親爭氣的莫言

母親說：「這十幾年裡，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樣，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發，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難，愈難愈要活。愈不怕死愈要掙扎着活。我看到我的後代兒孫浮上水來的那一天，你們都要給我爭氣。」

（莫言：《豐乳肥臀》）

莫言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的書名，是有象徵意義的，「豐乳」指的是母親，「肥臀」是大地，暗喻哺育中華兒女的祖國大地。換言之，莫言終於沒有辜負他的母親——祖國的期望，終於「浮上水來」，給他的母親、他的祖國着着實實爭一口氣！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傳說，半年前已在坊間瘋傳了。對此，我卻疑信參半。

我與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馬悅然教授論交，知道他已默默耕耘，把山西作家李銳的作品全部翻譯成瑞典文。

以高行健獲二〇〇〇年諾貝爾文學獎為例。當時劉再復把高行健的書稿《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稿件扛給馬悅然、並向馬悅然鄭重推薦，馬悅然才有機會得以接觸到高行健的作品，並且受到激賞。

馬悅然把高行健主要作品翻譯成瑞典文，使十八個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委員得以一睹高行健的文采和基本洞窺高行健的文學成就和美學主張。

高行健的獲獎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

必然因素是高行健首先是一個具有分量的世界級作家。這還不夠，還需要有一個伯樂的垂顧。

高行健的伯樂首先是劉再復，然後是馬悅然。千里馬比比皆是，伯樂卻鳳毛麟角。換言之，是高行健這匹千里馬遇到劉再復、馬悅然這兩位伯樂。

這也可以說是高行健的運氣。天時地利人和，永遠是致勝之道。

回過頭說莫言，他的獲獎也兼具高行健得獎的種種條件。

不同的是，莫言的芸芸作品中，瑞典的年輕漢學家陳安娜女士翻譯成瑞典文，只有三部，遠比高行健少。所以，當市面熱炒莫言是二〇一二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時，傳媒訪問莫言時，莫言曾說過一句話，他只有三部作品被翻譯成瑞典文。

莫言意喻他的作品被譯成瑞典文的數量很有限，瑞典學院對他的作品沒有通盤的認識，相信，連他自己也認為獲獎的機會不大。

這也是我所考慮的問題，我的一眾知道諾貝爾文學獎操作程序的文化界朋友，也持同樣見解。

結果莫言真正獲獎了。

那麼，莫言是怎樣獲獎的呢？

跌眼鏡文友包括筆者和莫言自己，其實忽略了一個緊要的關節，莫言的許多作品已翻譯成英文。

把莫言的大部分作品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廣泛讀者，是著名美籍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陳安娜女士也認為，「莫言的獲獎，葛浩文功不可沒。」

後來我還知道，除了陳安娜翻譯莫言的三部長篇《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臺之歌》、《生死疲勞》外，馬悅然之前已把莫言的中篇《透明的紅蘿蔔》、《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及莫言的創作理論等翻譯成瑞典文。

所以更準確地說，莫言之獲諾貝爾文學獎，馬悅然、陳安娜、葛浩文都是功不可沒的。（《莫言的獲獎》之二）

百家廊

陳曉鳳

公民感

去頤和園經常見到的一景，就是常年在水源保護區域暢游的泳者們。

無論春夏秋冬，他們都其樂融融地在標着「飲用水源禁止游泳」的水域中游泳，其中老年者居多。眾目睽睽之下，他們或在清涼亮的水域中暢游，或裸露着身軀在岸上聊天，喝飲料，吃西紅柿，儼然一幅百姓自樂圖。

然而，每逢見到這些坦然的野泳者，我總是為他們感到羞恥：在光天化日之下破壞規則，真是太不自重。最近，水務部門為了驅逐這些野泳者，在湖邊圍了一圈密密的鐵欄杆，再加上鋒利的鐵絲網，據說花了幾千萬元！可惜治理效果甚微，野泳者照樣能找到下水的地方。很多遊人憤然說，好像他們自己不喝城市的水一樣！

看看那些游泳者年齡，多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從小受的是愛國主義的教育，應該為人師表者卻如此行事，未免有點兒「為老不尊」。我覺得，他們漠視社會公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公民意識。一個熱愛自己生活城市的市民，不會隨意丟棄垃圾，公交站上會規規矩矩排隊，會自覺愛護公園的一草一木，絕不會為一時痛快去污染屬於全體公民的飲用水源。

當代，一個小學生都明白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成人更應有身為公民的神聖感。然而觀察一下卻發現，缺乏公民感的現象並非個別。

當每天地鐵上人們蜂擁而上爭搶座位時，當公共場合有人為一點小事兒爭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時，當見到紅綠燈前亂過馬路的人們、小販雲集地段骯髒的地面、路邊隨處可見的痰跡時，都會感覺到一個個與社會疏離的個體，他們生活在人群中，內心卻是寂寞的。那些茫然而空洞的眼神彷彿是在說：反正這不是我的城市，我願意怎麼「造」就怎麼「造」。除了我的生存，所有其他，都與我沒有關係！

並非只是一些外地打工者有這樣的想法，一些北京市民也依然抱着「只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觀念。垃圾處理以城市地下排水系統，最能代表城市文明程度。看看那些老舊小區的垃圾分類吧：雖然不同的垃圾置放桶標識很清楚，但很多時候還是亂扔一氣，西瓜皮扔在可回收的桶中，食餘垃圾難以從其他丟棄物中分出來。結果政府花了大錢建設分類設施，很多小區的垃圾分類桶卻形同虛設。儘管環保者聲嘶力竭地告訴人們垃圾圍城的嚴峻狀況，可很多市民卻依然我行我素，認為自己的眼前方便才最重要。「公德」這個詞兒，對很多公民來說，依然是陌生的。

與其譴責老百姓的「沒素養」，不如尋找漠視公德社會原因。

人類經歷了漫長的歷程，才有了公民社會。「公民」一詞最早出現在奠定人類法律基礎的古羅馬，選舉權、財產安全、接受教育的權利等等，都是公民權的核心內容，當然那時只有貴族才有公民權。世紀更迭，當代的公民社會中，公民的內涵有了更強的普世性。可雖然守法百姓人人擁有公民權，公民感卻是因人因地而異的。今天，連一個小學生都懂得公民的權利及義務，為何卻有人依然缺乏公民感呢？分析一下，大概有以下原因。

缺乏平等感

早年曾在一家國營大廠當機加工。工友們工餘時間的多在喝酒、賭錢，罵領導。某次偶然聽到一位滿腹牢騷的年輕工人說：工人沒有祖國！此話讓我無比震驚。心想，他這麼年輕，為何會有如此陰暗的心態？後來發現，因為深刻的底層感，有那種心態的工人並不是少數。那時車間工人幹活兒又髒又累，可在嚴厲考核之下，七扣八扣後工人的收入比科室幹部要低得多。此外在企業分房、漲工資等福利方面，工人也都排在最後。工人們認為自己用血汗養活着企業行政層，卻在企業備受歧視，根本就不認同管理層對工人的關於愛廠愛國的說教。有工人說，企業也不愛我，我憑甚麼愛企業？有的工人為了出氣，還會破壞、偷竊準備出廠的產品。這樣的員工，當然難具備健全的公民意識。

後來國企工人大批下崗，企業30年工齡的工人只領取7萬元的買斷工齡費。很多人從40多歲到退休的60歲，生活一直非常艱辛。同樣是為改革做「犧牲」，國家機關提前退休的公務員，不僅每月內退工資比工人高得多，有的還一次性獲得幾萬元的鼓勵費。游離社會十幾年的下崗者，早已成為社會邊緣人，他們能有公民的自信嗎？

平等機會以及經濟保障，是公民感的基礎。

血荒，現在成了常事。繁華的大街上，常見無償獻血的車前問津者寥寥。勇於獻血者，多數是能超脫謀生艱辛的精英。農民工不敢獻，獻血之後回到烈日炎炎的工地，老闆不會讓他們休息。農民把孩子老人拋在家鄉，在城市的全部生活意義就是把每一分錢寄回家去，一點兒病都不敢生，更不敢無償獻血了。鄰家保姆以前春節回家孩子們抱着不撒手，現在孩子習慣了與母親長年兩地分離。村裡家家有留守兒童。打工者為城市奉獻了一切，卻可能終生是邊緣人。

一次在醫院陪護，同病房一位陪護的中年人說，他在北京奮鬥多年，雖然有車也有房了，深刻的飄泊感還是揮之不去。戶口不在，孩子上學等很多事情上都感到很無奈。有人說，在北京闖紅燈、隨地吐痰、上車搶座的都是外地人，此話有些偏激。不過，同在一個城市生活，卻處處感覺到與他人的不平等，對城市的熱愛能不打折扣嗎？個體之間的疏離感，挫傷了奉獻社會的向善之心。

缺乏安全感

自公民概念誕生以來，財產權就無比神聖。自古以來，家都是一個神聖的堡壘。可是城市改造中強拆的殘酷記憶，卻揮之不去。當拆遷隊光天化日之下闖入私人院落扒院牆拆房頂，而主人卻告狀無門之時，就足以摧毀一個人的光明信念。財產的不安全感，滲透在不少人內心深處。窮人有不安全感，富人也有不安全感，當下中國富人舉家移民發達國家成為時尚，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對財產安全的擔憂。

■骯髒的地面，到處是垃圾。 網上圖片

缺乏參與意識

某次受社區之託擔任居民代表。可在選舉居民代表的過程中，很多居民對着候選人名單說：這些人我都不認識，怎麼選？我無言，只能先自我介紹，於是人家就草草全部劃對勾，算是參與了，至少剛認識一個。代表居民參加更高層次的選舉時，我也同樣不認識多數候選人，只能走形式全部對勾，有人就乾脆放棄了。

在信息不暢通的環境中，選舉權，這個公民神聖的權利，有時候難免流於走過場。多數時候，很多小區的選民根本不了解候選人，不知道候選人是甚麼背景，能為大家辦甚麼事。相比之下，農村的選舉過程還比較實在。選舉時，一些農民為了拉選票挨家走訪到處許願，甚至在飯店請大家吃飯，庸俗是庸俗，卻是更真實的民選過程。

公民感，不僅標識一個人的道德水平，更標識一個社會的道德水平。有眾多愛國守法、彬彬有禮、有公德心的公民，是城市的名片，更是國家的名片。

杜亦有道

阿杜

偷運人蛇（一）

因連日寫及南丫島船難問題，不少好友對阿杜昔日廿年海上生涯大感興趣，昨天便有一死黨老友特為此與筆者談起：「你幾十年飄泊五洋四海，可曾去過甚麼地方是印象深刻美麗難忘的？而令你能數十年後仍不斷回甘細味夢迴午夜的？

世界各地皆有不同之人和物，各具特色不同境界之風景人物，不停兜來轉去會再現腦際眼前，但形單影寂重複出現最多之一處，又認為是所歷之中最美麗的一處所在，便是南太平洋的一灣珍珠寶地越南之鄰柬埔寨南濱的一角「新港」——海圖上無正式名稱，我們航海日誌上則印「西哈努克港」，在此我們過了畢生最難忘的四天。

當年是一九七三年越戰正殷，東南亞打至「七國咁亂」，我們船受一間日本食品公司之委託，赴此柬埔寨南港載一船散裝蔗糖回九州，按海圖行程船泊入這南濱小港，此處有南太平洋最美麗幼白之沙灘，竟然往海邊斜伸至海中央達兩公里之遙，仍然是海水只浸至肩膊位，一路水清沙幼，俯首便可見游魚小蟹，碼頭邊岸畔有一半建在海水上之迴廊酒店，房間潔淨優美，廚部全供應海產，招牌名為「桂潔蓮酒店」。原來那時柬國仍受美軍保護，越南戰事未亂及金邊，有一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夫人積潔蓮要來此人間勝景度假，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特別建設此酒店來招呼她的。但此時戰事已緊，政府守軍已全撤走，糖廠碼頭一帶只餘一片無政府狀態小市集，小販林立、小賊亂竄。碼頭間中會泊兩艘外國貨輪，市集上便有些龜婆（鴇母）由較北之首府金邊市帶來一車車的青春妓女，帶上船巡來走去展示，任由船員挑選，鴇母說這些都是可憐人，家中家長全給柬共趕出金邊生死未卜，越共一入城她們也必身魂肉體皆不由己，希望你們海外海員可憐，看中她們一兩個，立即收匿船艙內帶走，每個少女一命之價只要千五至二千美元，買了收在艙底，帶返香港或台灣，為婢為奴可以救她們一命，「不是買人當作做好心吧。當年海上運『人蛇』者頗多，有些少女便如此給『救走』了。」

隨想國

興國

扮鬼嚇人

十月三十一日是西方的萬聖節，那天夜裡，人人都打扮成鬼模鬼樣的，為什麼要叫做萬聖節呢？原來這個英文的「哈囉喂」，辭典的解釋原意是「所有聖者的節日之前夕」，翻譯為求簡化，就譯作為萬聖節。

根據蘇格蘭的凱爾特人傳說，十一月一日就是冬天的開始，所以在冬天來臨的前夕，死去的亡魂會返回故居，要借活人的身體來重生。有點像我們的農曆七月定為鬼月，鬼門關大開，鬼魂都到陽間來找替身一樣。因此，人人都不願意把活著的身子被亡魂借去，於是人人都扮成鬼的模樣，表示自己也是同類，也在找尋活人，以此來避過一劫。

演變到現在，扮得鬼模鬼樣的，是用來嚇人，是用來狂歡，是用來和朋友或不相識的人說聲：「哈囉！喂！」但這「哈囉喂」因為狂歡太過，難免會樂極生悲，因而在香港曾經發生過意外踩死人的悲劇，變成真的有活人被亡靈找去做替身了。

好在小孩子都不能喝酒，因此就不能去逼死人的「爛鬼坊」。小孩多數去體會的，是迪士尼的鬼屋探險和群鬼巡遊。群鬼巡遊是看熱鬧，探險鬼屋是讓自己受嚇過癮，尋求驚嚇的刺激。像今年迪士尼的「詭墳學院」，連大人也會被那突如其來的人扮鬼嚇到，更有小孩嚇到哭了，雖然哭，但回想時卻感到自己有膽進去，覺得光榮得很。

事實上，所有的恐怖電影或者恐怖樂園，都是人嚇人而已，更多時是自己嚇自己，因為哪裡來的鬼？都是人扮的。香港人常說，人嚇人有藥醫，這話說得不對，人嚇人根本就不需要藥物來治療，多嚇幾次，膽子就大了。像我兒子，幾年前第一次去迪士尼鬼屋時，怕得要命，回家還會做噩夢。但今年去時，卻感覺歡樂之至。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兼職主婦的狂態

《OUT——主婦殺人事件》的內容固然黑暗陰冷，但一旦撇除殺人及分屍的犯罪部分，而把一眾婦女的生存處境加以審視，便可以清楚看到她們身處的困局。能力出眾的雅子在職場上一直遭人打壓，彌生面對家暴，而良江既要照顧不討好的婆婆，而反叛的女兒又不斷向她施壓——簡言之，她們在便當工場的通宵工作，本來就是四周環境的逼迫寫照。甚至在工場附近，同樣有色魔時常出沒，令她們的人身安全沒有保障。我認為桐野夏生把她們刻劃成為逐步走上分屍集團之路，正好從側面點出在社會的正常渠道下，根本沒有變易的可能空間，惟有以非法手段，才可以一時一刻突破社會的桎梏掣肘。

此所以連結起奧田英朗的傑作《邪魔》來看，我覺得便極為有趣。主線本來在茂則公司的縱火案上，他因為被懷疑縱火去消滅貪污的證據而被警官盯上，但故事發展下去，更有意思卻在他太太恭子身上。三十四歲的恭子在超級市場兼職，某天收到工運人士的來電，勸誘她挺身而出對公司的不公平待遇作出控訴。她由退縮迴避到逐漸走上前線，以為透過法律途徑便可伸張正義，理直氣壯去改善待遇。最終工運組織在私底下與公司達成協議，收取掩口費後便撤手而去。恭子徹底覺得受到出賣，自己後來甚至出賣肉體給公司的董事長——一旦發覺法律原來沒有清晰的界線，她便走上狂態的瘋癲之路。為了掩飾丈夫的罪行，她不惜企圖殺人及縱火，一切只是為了保護家庭的完整，小說終局更淪為逃亡的通緝犯。奧田英朗在此突出了主婦更曲折的心曲，在她們的視野及能力範圍內，即使有人願意伸出援手，其實也逃不過法理的利用，成為他人的玩偶，最終就如桐野夏生筆下的主婦般，同樣走上犯法以求自保的狂態之路。